



申霞艳、姚钰婷、陈杏彤、李丹、马妮娜、刘悦华、陈晓亭、毛茸清、赵琦、谭莉、郭婧等 11人正在讨论中

作为身份共同体的“二本学生”——从黄灯《我的二本学生》谈起



明湖读书会

明湖读书会于2018年4月23日成立，是一个在暨南大学中文系当代专业老师指导下由爱好读书写作的学子组成的读书会，成员含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百余人，成员从2019年起曾参与《作品》杂志的“品藻”专栏及“明湖杯”大学生文学评论比赛。



申霞艳：《我的二本学生》是从黄灯心里缓缓流淌出来的，是从上课时的作文、课后的散步、日记本和课间零碎的对话、微信点对点的交流中来的。黄灯并没有太多预设，任百草生长。黄灯自己曾是“70后”的二本学生，后来到了F学校任教，接触到“80后”“90后”的二本学生，这种代际和身份的对比打开了作品的纵深。黄灯温暖、多情，有写日记和保留“信物”的好习惯，她是生活的有心人，以写作对抗时光的流逝。她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接着她又出版了《大地上的亲人》，新作《我的二本学生》先在《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很多公众号都有转载、讨论以及采访。黄灯又一次切中了时代的脉搏。

今天来谈论这部作品，我以为至少有两个方面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是文学的角度，作为非虚构的代表作家，黄灯是如何将零散的“教学札记”结构成当代教育的考察样本。二是从社会学角度发散去，大家如何看待二本学生群体以及当代大学教育。

姚钰婷：《我的二本学生》是融翔实材料与广阔视野于一体，铸人文关怀与理性思辨于一身的非虚构作品。黄灯明显不满足于在书中单纯罗列学生的故事样本，而是志在“透过现象看本质”，思考一个个二本学生经历背后所折射出的中国大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考察代际交替之间呈现出的差异以及时代变迁图景。

她在书中将其大学时所在的“9202班”和从教生涯中遇见的“062111班”“1516045班”进行对比，它们分别对应“70后”“80后”与“90后”三个不同群体。从个体差异的角度中跳脱出来，黄灯得以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国家发展、时代变迁中的二本学生命运。“9202班”的“70后”大多就业稳定，生活平静安逸。“062111班”中“80后”的生活虽开始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功利、竞争，但也享受到了时代夹缝中的光芒，大都较好地安顿了自己的生活。给黄灯代际感最深的“1516045班”的“90后”，他们是信息时代的获益者，同时也是市场化时代的压力承受者。高涨的房价、严峻的就业形势、昂贵的一线城市生活成本，使他们内心深处充斥着迷茫与沉重。黄灯的眼光是深邃且广阔的，透过她笔下三代二本学生的不同遭遇，我们窥见了短短30年间中国经济腾飞、社会快速转型的大时代变迁境况。

陈杏彤：我最为感动的是黄灯的身份切换，她不仅表达出老师对学生的关怀，还代表了父母、师长这一辈人对当代年轻人的洞察和理解。她之所以能跨越“海”和“渊”的代沟来给予年轻人体谅、安慰，是因为她并不将“70后”“80后”与“90后”视为断裂的存在，尽管这三代人各具特色。作者注意到“70后”经历的国企工人下岗潮成为一个家庭中的隐痛，并延伸至下一代的职业选择上；广东农村地

区有大批“70后”常年外出打工，导致不少“80后”“90后”以“留守儿童”的身份成长起来；漂漂第一代是否购入房地产成为第二代能否立足城市的决定性因素；“90后”面对着“80后”人生际遇中就已出现的分化，突破阶层固化日益艰难。《我的二本学生》带领我们回望城市地理空间的变迁史。改革开放初期，一些错过高等教育或被下岗浪潮抛下的“70后”来到珠三角，城市建设有大量的空白之处等待他们。“80后”在广深发展的上升期步入社会，尚可抓住相对多的就业机会和稳定的房价，沿着时代缝隙的光芒寻找突围路径。待到“90后”就业之时，有限的公共资源已更难调配，广州城的边界向更为偏远的从化、增城推移。面对日益逼仄的上升空间和飞涨的房价，社会的中间人群——二本学生无奈之下选择撤退，于是呈现出1516045班的学生们“从没想过留广州”的局面。读者们通过《我的二本学生》足以看见和了解“80后”“90后”，他们不是“新新人类”，而是与中国现代化发展同步成长起来的。该书也正在警醒着家庭、学校、社会以及学生自身都应将大学教育的意义回归到“认识自我、了解自我”，即便并不能全靠“读书改变命运”，但这句话始终不会成为悖论。

李丹：黄灯以极大的热情探讨广深大都市和二本学生个体命运之间的关系，企图从类似于社会固定群体调查报告式的记录中找出二本学生群体毕业后生活状况的规律。最后她发现学生个体的成长路径充满着多样的变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气息，他们的生命依托于广州这个城市绽放得更加鲜艳。《我的二本学生》对于城市空间的描写真实而又虚幻，龙洞多年前郁郁葱葱的树木，参差不齐的楼房，多年后鳞次栉比的商业中心，繁华耀眼的大牌商标，都是这个区域的实景。黄灯带着眷恋、欣赏的情感为广州龙洞着色，她笔下二本学生在自己理想城市打拼的感人故事也是一代青年生活的真实写照。作为许多青年趋之若鹜的大城市，广州以其包容的心念、开放的环境、发达的经济、温暖的天气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年轻人，但它永远不属于某一个体，而是群体理想的映照。不过这座城市夺目的光彩会成为这群学生成长的底色，让他们获得更多生活智慧，明白自己内心真正所要。

马妮娜：市场经济下资本与资源主导的高等教育，致使就业压力骤增，尤其当一线城市大企业的招聘简章上赤裸裸地写着“第一学历为一本院校”，二本学生成为了被自动忽略的“他者”。在毕业就可能意味着失业的年代，社会一开始就为二本院校设立了一道无法跨越的门槛。

在仅19万字的文本中，作者通过一些具体小人物的故事，架构起了一部广州的城市变迁史，诸如成长、教育、就业、房价、代际关系……都是广阔、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这本书不仅仅是写给二本

学生，更是写给所有人。写给年轻人，让我们在残酷的社会竞争机制里，多一份坚持与希望、少一点功利与焦虑；写给教育工作者，愿他们带着眼睛和心，去关注朝夕相处的学生；写给父母亲人，希望他们给予正在成长的孩子更多的支持与爱，家庭始终是一个人勇气的来源；也写给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对年轻一代多一点宽容。

刘悦华：作品聚焦当代普通青年群体的生存图景和发展现状，“二本”一词，其所指不仅仅是高考过滤的结果，它映照着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小说善于追寻二本学生生活中的隐秘角落，深入描绘、刻画人生轨迹，从“二本”的放大镜里窥探社会的各种问题。作品将几十年前的“二本学生”与当下的“二本学生”进行对比，发掘时代发展投射在个人身上的绚烂与阴影。二本学生生存在高速发展的链条末端，是朴实的工薪阶层奋力追赶社会高速发展的脚步的结果。教育资源的相对匮乏，主体向上挣扎的生存形态，小镇做题家面对的生存困境，现实修罗场里，二本学生上演着与生活焦虑之间的困兽之斗。

陈晓亭：人无法改变自己的来处，却可以决定自己的去向。教育的意义，在于为自己的人生博得更多的选择权。但年轻人进入社会后却发现自己拥抱的并非光明未来，而是焦虑与迷茫。《我的二本学生》以教师视角观照二本学生的生存图景，折射年轻一代的普遍的命运走向。二本学生的尴尬，在于文凭所承载的那一丝希望，让他们看到了似乎跳一跳便能摘到的果实，然而当他们真的试图凌空一跃时，却发现脚下的负重不断将他们往高处拉扯，在夹缝的境遇中体会着“高不成、低不就”的悬空之感。他们虽生活在这个城市，却不属于这个城市。面对日益固化的阶层壁垒，他们感受到了一种无话可说的麻木、一种无处突围的无奈、一种无路可走的绝望，但广东奋斗的商业精神的浸润让他们不甘于此就屈服。黄灯的写作，正是以二本学生突围的努力为标尺，丈量一个时代发展的未来空间。

毛茸清：黄灯将二本学生的命运与原生家庭联系起来，家庭优越不仅塑造学生的性格，也让她们拥有更大的试错成本，能够无后顾之忧地追寻心中所想。反之，贫穷的学生“没有太多的选择”。二本学生比之重点大学的学生处于更加尴尬的境地——他们属于中国大学中最庞大但又受重视的群体。黄灯清楚地看到了学生在不同领域的无奈与挣扎，但并不悲观，她希望学生能够明晰自己内心的选择，从现实和命运中突围。

赵琦：《我的二本学生》意在探讨大众化教育时代，乡镇青年的命运遭际与其身后家庭之间隐秘的关系，并追问中国普通年轻人突围的方向及可能性。黄灯借“80后”“90后”两代学生的“众声喧哗”和他们碎片化的故事告诉读者，关键是在大时代的

浪潮中找到自己的赛道。就业压力、学历贬值这些现实问题似乎表明，学生的去向越来越受制于其背后的家庭资源，但黄灯反对原生家庭决定论。一方面，她在结构性问题显现的地方用人道主义的微光照亮那些踽踽独行的奋斗者；另一方面，在她的书写中，家不只是一屋一院，也是精神港湾，她重现了虚构文学作品中黯淡已久的家族精神。重视教育、坚忍不拔、开垦蛮荒，上一辈人有他们的局限，但正是父辈们的挥汗如雨和奋力托举，无数青年才有机会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说到底，家庭只是一个起点，而朝着什么方向如何走下去，更多的是一个有关自我探索的问题。黄灯警惕分数、绩点、证书、职称这套世俗的价值体系，一个更好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她还追问，当教育的价值由“认识你自己”变为“改变命运”，数据、算法制造出源源不断的层级、竞争和焦虑，拖着人在赛道上被动前进的时候，我们是否离真实的生活经验和内心真正的需求越来越远。

谭莉：大众化教育时代，“985”“211”“一本”“二本”等概念涌现，将大学生群体分割成多个部分，但是能够进入名校的学生终究是凤毛麟角。处于大学金字塔底端的二本学生构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既不受重视，也很难得到话语权。“二本学生”深知这一身份给人生道路带来的阻力，他们身上独立而坚定的精神却让人动容。黄灯注重呈现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发生的蜕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承载家庭的殷切希望，通过教育离开家乡，只身来到大都市打拼。当遭遇现实困境时，他们身上表现出“90后”一代惊人的毅力和耐力。无论是考研考公的路上屡战屡败，还是在就业路上磕磕碰碰，他们仍然坚定自己的路。竞争时代给二本学生带来的危机感使得他们明晰自己的处境，不会做不切实际的梦，而是脚踏实地地前行。即便是有房的“漂二代”也从未想过依靠父母的财产过活，他们都更重视自己的独立奋斗。他们用努力将前人对“90后”的标签重塑，“坚韧”“坚持”“坚定”或可成为其新的共名。

郭婧：《我的二本学生》为人们观照这一群体提供了多个视角。一是珍贵的社会样本。从包分配到自主择业，二本学生的自由度虽提高了，但也意味着他们需要以一己之力来承担就业、购房、养活家庭等的风险与压力，与自由度成正比的是焦虑感也在大幅度提升。从学生视角阅读，更使人产生共鸣。当教育只能给学生带来“分数为王”的理念，当“二本”已然成为一个学生考研、就业的先决条件，我们是否应该反思在教育这条路上到底是走远了还是走偏了。回归“教师”的写作视角，作者以平视的姿态记录下了学生百态，其温润平实的语言，让人深切感受到一个老师对学生的责任、用心与关爱。这份爱，也正是推动二本学生走到聚光灯下最真实的原因。



田雪菲、赵志军、战玉冰、李博权、李杨等 5人正在讨论

《庚子故事集》：用漫长的时间等光来

线性时间与空间渗入

田雪菲：读完《庚子故事集》后，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去记忆故事，“空间”显然可以作为一种记忆术，提供叙事“定格”的艺术效果。与时间的流动性不同，空间可以“悬置”时间的飞逝，激活我们的记忆。利用这些被定格的空间，我们能够轻易回想起彼时彼地人物的矛盾处境和复杂情绪，如《核桃树下金银花》中，“我”游走在玉林街上期望与“胖天使”重逢；《鼠辈》中，北京城无数“炫灿”大楼的灯光与落单的鼠辈们构成呼应；《人类的算法》中，女主人公在国外、家、酒店这三个空间中切换身份；《掩面时分》中，人物关系场景也无非是露天餐吧、医院和办公楼；以及《羊群过境》中不断被唤起的甘南场景。人物既属于时间，也同样属于空间，如果不考虑空间因素，可能会忽略掉文本本身的某种复杂性。

赵志军：《丁酉故事集》叙事时间和空间还是统一的，而在《庚子故事集》中，身体实在的空间与记忆或者情感牵系的时空是割裂的。尤其是《羊群过境》，“我”被禁锢在家中，与蒙古捐赠的羊群过境甘南的开阔幻想，无疑通过这种幻想创造了巨大的空间张力，而幻境越开阔，越显得疫情之中人被束缚在有限现实空间中的煎熬。

战玉冰：从《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到《庚子故事集》，弋舟这几本小说集在命名上明显呈现出某种“编年史”的创作意图。“时间”既构成了他这几本小说集的名字，也深深内嵌于其中每篇小说的深层肌理。他这几本小说集中大多数的作品，都可以借助弋舟在《丙申故事集》“代后记”中的说法来加以总结和解释：“与过去重逢，回溯与检索，不就是时光的题中应有之意吗？”而弋舟这几本小说集中的空间表现，相对而言则比较分散，并不是统一的“约克纳帕塔”式整体构思，但依旧各有其特点。比如《核桃树下金银花》中，“我”去送快递而后在街巷中迷了路，街巷在这里成为了某种迷惑性的空间，更可以视为主人公当时心境的象征性外显，而“胖女孩”的出现在这个意义上则是对“我”的指引与解救，有一种迷惑之中获得希望的意味，这种街巷

之中的迷惑感让我想到莫迪亚诺的《暗店街》，是一种很迷人的都市空间书写。

李博权：如果严格看待小说题目“庚子”的时间性，无论是作者的写作时间还是叙述的故事时间都呈现出逃离这一“总体”时间的框定。因此如果讨论小说的时间性，主要体现在读者阅读时的时间感——小说的直接叙述以及小说内容涉及时间的空间形式表现。即作者在尽量避免对时间的“确定”，而是通过小说场景—空间的叙述形式来表现“此刻”的时间。但正如卢卡奇在《叙述与描写》中所说：“空间的现场性把人和事变得具有时间的现场性”，不过这里面作者有意调停的痕迹就会很重，一种出于叙述的“刻意行为”让这种“现场性”变得“虚假”，于是，叙述时间、故事时间、现实时间在空间里“欢聚一堂”。那么这种不被确定的“时间”却又表现出强烈的时间感就在阅读的过程中互相冲突，最后会落在哪里就取决于一种阅读的“选择”，这也是一种开放性吧。

情节破碎与瞬间凝固

田雪菲：“破碎”是我阅读这部小说集最先发出的感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故事场景的跳跃与转换，每篇故事至少包含三个及以上的场景，而场景之间的转换常常倚靠人物的回忆或联想，这往往造成“出其不意”的阅读效果；二是作者在小说叙事中表现出强烈的“意识书写”姿态，小说人物的意识告白不断敲击故事主干，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小说的叙事节奏，使读者阅读起来并不容易把握叙事的进程与方向，因此也就不那么感到“舒适”；三是场景的转换与人物自白的打断使故事情节发生支离，整体呈现出拼接、碎片化的感受。但我想指出的是，虽然作品带有破碎的色彩，但每篇故事的结尾似乎都在寻求一种“和解”，仔细体味的活，这些充满深意的结尾大都传递出和谐、温情与希望，这正构成了作者写作的另一种诗意存在。

赵志军：我接触最早的弋舟小说是《巴别尔没有离开通天塔》，最直接的阅读感受，这是一篇关于人在关系系统中存在状态的寓言，可以直接

与《圣经》巴别塔故事进行对应阅读。巴别塔讲的是大地上的人们联合起来建筑一个伸向天空的通天塔，去验证上帝是否存在，上帝打乱了人们的语言使之无法沟通，通天塔的工程便终结了。我个人更愿意把通天塔视为通天塔坍塌之后，在大地上遗留的庞大而破碎的废墟。其中的人们正是处于一种无法沟通的后巴别塔境遇。对应来说，如果说弋舟创作中确实存在一种破碎感的话，作为其对应物存在的整体，应该是一种人与人沟通顺畅、和谐共生并真正作为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境遇，关涉的始终是人的生存状态。

战玉冰：“破碎”其实并不只是弋舟一个作家的特点，而是“70后”“80后”乃至更年轻一批作家的共同书写特征，与“50后”作家们更加渴望从整体上把握时代和历史的创作“野心”有很大不同。年轻一辈作家们小说中的这种“破碎”，一方面对应的是对日常生活细节的表现，似乎通过这种破碎的书写方式，就可以更好地抓住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尽管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明显的距离；另一方面，也许弋舟有意通过这种“破碎”的方式来试图逃离某种生活的“宰制”。比如他常常通过插入一些令人意外的情节与情绪营造出陌生感和惊奇感，或者是通过突如其来地时间、事件与人物来打断之前的叙事进程，进而营造出一种诗意。这种“破碎”所形成的人物内心张力也是很微妙的，这种微妙可以说正是弋舟最善于捕捉和表达的内心感觉。

建立与坍塌仅关乎自身

赵志军：如果留心《鼠疫》的插图，诡谲的画面中清楚地立着一个十字架，这种浓厚的宗教意蕴，是我读弋舟作品时主要的进入路径。“失败的胖子”“落单了的家伙”被禁锢在庸常与破碎之中，像快递一样被“下单”“运输”，然后放置于某种规定的情境。当他们试图通过记忆或幻想突破这种禁锢时，寻找“应许之地”这一宗教过程便被激活，于是“漫山遍野的壮丽的花海”以及“炫灿”的城市之夜在漠然的叙事中温暖地凸显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幻想被粉碎，记忆被证明虚无，一种强烈的荒原感就此而生。正如《核桃

树》的插画，人在追寻途中坠落，被嶙峋的大地永久地固定为破碎的形式。这种比较缥缈的宗教意蕴，漫溢于弋舟多数的独语小说中。它们虽然语涉灵肉关系，但没有严肃地构建宗教精神体系，不在人性神性的谱系中寻找人物位置，而是努力呈现那些能够审视自身存在、能够鼓起勇气追寻应许之地却最终失败了的人物其内在的，一种无关乎神亦无关乎他人与环境的极孤立的宗教情感世界。如同思绪起落，其建立与坍塌都与外在无涉，仅关乎自身。

田雪菲：我所理解的荒原感，有另一种面相，类似于个体置身于“无物之阵”中的自我搏斗。五篇故事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有这样的“荒原”体验，实质上这是现代都市人普遍的精神荒原处境。那么，作者如何处理这一荒原感。很明显，弋舟通过加入大量的宗教元素，来召唤精神的“原始强力”，趋向于人的自我拯救。如《核桃树》中，“不过区区二十斤”代表了“我”的生命限度，“我”不断与这二十斤搏斗，也是在与生活博弈。以及《人类的算法》中，数字“150”代表的是人类认知能力被允许承载的极限，当超过这一极限后，生活就会重新洗牌。在类似种种上帝视角的审视与指引之下，“我”不断接近甚至获得了近乎神旨般的精神感悟，与自己、与世界达成和解。

李杨：《羊群过境》中，“羊”出现过三次。一次是在标题中，一次是“我”和父亲讨论去甘南吃羊肉，一次是结尾处“我”脑海中看到高原的地平线上有羊群过境而来。在小说中，正是吃羊肉的欲望让“我”得以劝服父亲前往甘南，而出现在幻觉中的羊群过境让“我”得以爬出黑暗的天空。除此之外，融合物质作用与精神表现于一体的“羊”的形象，帮助弋舟思考满足物质需求与探查精神困境，提供了绝佳的符号载体。

李博权：正如弋舟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在医护之外还有很多人正默默维持这个世界的秩序，在口罩之下还有很多隐忍不发或难以言说的心事与秘密，在疫情之外人类还有很多‘轰轰烈烈’的平庸困境，以及孤独与爱。”这里我们不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凝视“庚子”这个时间整体时，我们究竟在看什么？



云友读书会

有书友自“云”中来，不亦乐乎？云友读书会成立于2020年5月，是中国作家网在疫情中联络策划的线上跨校青年交流方式。此读书会面向热爱文学的青年，通过线上学术沙龙、读书分享、主题演讲等活动，推动青年学人的文化与学术交流，力求以文会友，激荡思想。云上时光，吾谁与归？

